

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

·刘永加·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后的第13天，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了下来，而且国民党中央军立刻大兵压境。此时，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心情急切，结果与王以哲军长为首的主和派东北军高级将领发生激烈冲突，酿成悲剧性的“二二事件”。

危急关头，周恩来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局势，稳定了西安的局势。

内部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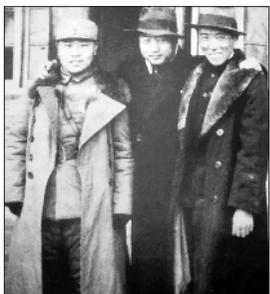
张学良把蒋介石护送回南京后，蒋介石立即翻脸，下令扣押张学良，并推出软禁、审判、特赦、“严加管束”等制裁张学良的措施。同时，蒋介石挟张学良而令西安诸将领，事态日趋危急。

1月11日，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方面的甲乙两方案。其中甲方案是：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彬州以西的西兰路上；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回陕北；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

同日，被从南京送到溪口武岭文昌阁的张学良，当夜给杨虎城等将领写了一封信：

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关于两案，请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请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

此时，东北军内部分成两派，意见分歧很大：少壮派坚决主张南京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后撤兵，否则不惜拼死一战；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将领则表示应以张学良的指示行事。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主和是为了向



左起：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

南京投降，并欲取代张学良。因此，他们对王以哲、何柱国等疑窦丛生，最后发展到誓不两立的地步。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中也有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致使杨虎城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采取的方针仍是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纠纷。为回击南京的军事进攻，周恩来又同东北军和西北军两军高级将领商定：组成三方面的联军，做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同时，杨虎城派第十七路军李志刚、东北军米春霖和鲍文樾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之后，蒋介石同意西安方面派人与顾祝同等在潼关谈判。经谈判，西安方面决定采用三方都比较接受的甲方案。当潼关谈判接近尾声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战的问题上发生日益激烈的意见分歧。

局面激化

1月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

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经过激烈讨论和听取各方意见，最后还是决定和平解决。

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公馆时已是后半夜，何柱国送走杨虎城和周恩来后，又回到王以哲身边，表示了对少壮派的担心，建议二人一起搬到杨虎城公馆避一避，但王以哲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何柱国一直与少壮派打交道，深知他们年轻气盛，可能干出一些过激的行动来，当夜他就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就在当天晚上，有少壮派“三剑客”之称的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等人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痛哭流涕，请求红军帮助他们与蒋介石拼个高低，救出张学良。周恩来先安抚他们的情绪，答应考虑之后给与答复。经过与叶剑英、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等人一起商讨后，第二天，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

1937年2月1日，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在张学良公馆召开秘密会议。孙铭九主张打死主和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何镜华不同意，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晚10时许，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3人又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极端行动。

2月2日早上8时许，众多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来到应德田、孙铭九住处。30多名少壮派军官群情激奋，一致同意除掉王以

哲、何柱国等10多名主和派将领，并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

第一个牺牲的是王以哲。东北军卫士营连长于方俊带队直闯王以哲公馆，众人向王以哲连开数枪，几乎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长、通讯处长亦被枪杀。何柱国由于杨虎城的庇护，幸免于难。

妥善平息

此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的王炳南，正在杨虎城部队中做地下工作，听到消息，连忙去报告周恩来。不料，在王炳南来到之前，一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已经杀气腾腾地先一步闯进周恩来的临时住所。危急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告诫少壮派的行动恰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害了张学良！周恩来一番严词煞了他们的威风，几个青年军官立即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为嫁祸于中共代表团，潜伏在西安城内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谣言，说应德田、孙铭九等都是中共党员，他们是受中共代表团的指使滥杀东北军高官。应对此危局，周恩来果断宣布应变计划：一、代表团迅速撤到云阳镇待命；二、周恩来和叶剑英等留下来继续工作；三、代表团撤离之前，全体成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去粉巷吊唁王以哲军长。

2月2日下午，周恩来身着灰色外衣，左臂上戴着黑纱，率

领中共代表团全抬着祭奠花圈，到粉巷吊唁王以哲。这是自王以哲军长遇害以后，第一个前来吊唁的队伍。当时王以哲的灵堂尚在布置中，周恩来一进屋就亲自动手帮助布置灵堂，然后领着中共代表团缓缓走进灵堂，敬上祭品，向王以哲的遗像深深地鞠3个躬。中共代表团第一个赶来吊唁王将军，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层人士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减少了对中共的误解。

2月3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来孙铭九等人。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这时也慌了手脚，提出3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交由中共带往苏区处理。周恩来权衡再三，把几名犯错的少壮派送往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是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吕正操、王炳南回忆：

那些天，周恩来忙到不可开交。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每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广大将士中赢得了信任与友谊。（摘自《文史春秋》2023年第1期）

黄埔军校首个女生队

·黄河·

黄埔军校在经历“东征”“北伐”后，名声大振，在革命浪潮中，武汉分校成立，经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推动，1926年底启动招收第一批女生，1927年初成立首个女生队。这比美国西点军校女生队还早约50年。

革命派主导组建

1925年，在第15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共产党人支持的《中国军人》杂志刊载了一篇名为《军人和妇女》的文章，作者是女共产党员胡筠。文章疾呼中国的军校和革命军队应该招收女性学员和女兵。此文在中国妇女界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有志女青年甚至千里迢迢来到黄埔军校，提出要求军校修改条例招收女生。

一名叫金淑慧的女子家境较好，法政大学毕业，一心想上军校。1925年6月9日，她直接上书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表示志愿成为一名“革命的女军人”。见军校方面没有答复，她又只身前往军校陈情，但蒋介石避而不见。金淑慧后又上书，表达从军的心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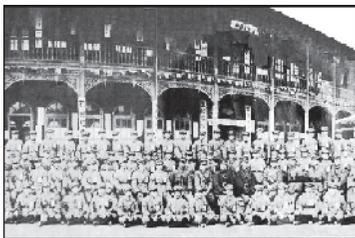
疾呼受到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关注，他安排校刊发布征文专门辩论。一期毕业生、共产

党员李之龙听说此事，专程找到廖仲恺，苦口婆心地阐述军校招收女生的革命意义。苏俄军事顾问尼罗夫将军和他的夫人在金淑慧的说服下也加入支持者的阵营。尼罗夫将军的夫人曾就读伏龙芝军校，她对廖仲恺说：现在许多学校已经开男女同学风气之先，黄埔军校作为当时观念最新潮的学校，反而要落后他人吗？

通过辩论，不少原来持异见的人改变了观点。1926年至1927年间，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武汉分校在恽代英、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公开向全国招收女性学员。

巾帼不让须眉

武汉分校招募女性学员的消息唤醒了更多进步女青年。全国各地进步女性纷纷报名，原本计划招收100名，由于报考人数过多，共录取女生183人。一部分未被录取且较为优秀者，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南湖学兵团录取。



1927年2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名学员编入女生队，女生队队员人数达213人。女生队队员课程、作息设置几乎完全借用了男生的内容。军事教练课主要包括操枪、刺杀、射击要领等战斗技能训练等。军事理论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内容。唯一的区别是特设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课程，讲授者是沈雁冰。

武汉分校成立后，中共派出多名同志到军校工作。恽代英担任分校政治总教官，还分管女生队的工作，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陈毅担任军校的文书，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等。女生队队员中有多名共产党员，指导员彭漪兰曾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彭华在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就加入共产党，胡毓秀入学前曾为高安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

黄埔女生大队的创举，受到斯大林的关切。斯大林通过苏联驻汉口大使加拉罕转告武汉分校，要求女生队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拍一张集体照片，校方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于1927年3月5日为黄埔女生队拍下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见图）。

烽火岁月显风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17日，蒋介石唆使驻防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发动叛乱，直逼武汉国民政府。军校决定由叶挺率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迎击叛军进攻，女生队编为由救护队和宣传队组成的政治连，接受叶挺指挥。

奔赴战场的女生们与作战部队一起冲锋在前。这次出征共34天，200多名女生队队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谢冰莹结合经历写的《从军日记》在《中

央日报》副刊连载，轰动全国。

3个月后，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发表反共声明。无奈之下，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女生队被迫解散。213名女学员除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习外，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担任文书、宣传等工作，这一部分女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批女兵；也有部分人回到家乡，还有的从事地下工作。

著名的“黄埔四女杰”胡筠、赵一曼、游曦和胡兰畦，继续英勇地救国报国，成了我党的优秀战士。胡筠回到家乡湖南平江号召农民起义，后来成为红军唯一一位女师长。赵一曼赴东北抗联工作，1935年不幸被俘，次年8月，她用31岁的生命实现了“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誓言。游曦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后来南下参加广州起义，壮烈牺牲，时年19岁。胡兰畦辗转德国、法国、苏联等地，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组织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后来在重庆“潜伏”，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摘自《炎黄春秋》2023年第3期）